

一口号是在我们多年从事社会史研究与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从本质上讲它也是一种核心的问题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史学研究的资料范围,而且能够使研究者获得历史的现场感。对此,笔者曾指出“走向田野,深入乡野,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6][17-8]}所以说,社会史研究中的田野工作,首先要进行的是一场“资料革命”,也就是说,在获取历史现场感的同时获取地方资料,在获取现场感和地方资料的同时确定与认识研究内容。

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问题,亦是我们从已搜集到的大量基层档案资料中认识到的。举例言之,根据我们初步的分类整理,这批资料内容包括农村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账、实物收付账、现金收付账、实物明细账等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中央、省、地、市、县、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各级的文件、计划、总结、制度、方案、意见、报告、请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各类文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量阶级成分登记表、斗争会和批判会记录、匿名信、告状信、决心书、申请书、判决书、悔过书、契约、日记、笔记等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宣传画、宣

[行龙(1958—)男,山西省新绛县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传册、领袖像、红宝书、红色图书、各地不同时期各种小报、各类票证等等^[1]。这里还只是就村庄一级的档案资料进行介绍,还有供销社、粮站、医疗诊所、广播站、学校、百货公司、林场、水库、厂矿等地方的资料也是应有尽有,不胜枚举。毫无疑问,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资料群”,仅仅凭借研究者的个人行为是很难胜任的。只有通过“集体调查”,才能在这场新的“资料革命”中全面系统的搜集档案资料,从档案资料中发现问题,从发现问题中解释历史,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链,进而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总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任重而道远。全面系统的进行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的建设工作,特别是能够潜心多年投入到“资料革命”的工作当中,更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基础工作。但是,笔者始终坚信,历史研究,掌握资料是第一位的,有了完整翔实的资料,才有可能书写出全面完整的当代中国史,也最终才能去完成包括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直至当代社会史在内的整部中国社会通史的巨著。

[参考文献]

- [1]行龙. “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M].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4).
- [2]王海光. 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4(5).
- [3]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 长沙:岳麓书社, 1998.
- [4]王泛森.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J]. 新史学, 第8卷第2期.
- [5]J. 勒高夫. 等. 新史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6]行龙. 走向田野与社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资鉴当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现实功能

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兴旺,不仅改变了以往史学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还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选题及内容。特别是近几年,在朱佳木、田居俭等学术界前辈呼吁和推动“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以来,中国当代社会史逐步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学科建设开始稳步推进,学科理论研究有所深入,社会史视角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中国当代社会史既是学科发展的产物,更是时代发展、社会实践的产物。近些年来,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都敦促我们以之为主攻方向及早展开研究,回溯历史,探究其形成的根源及解决途径,并进而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决策上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特别是民生政策,更加注重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国家政策的变化

为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提出了新的命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也随之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决定了其必将带有较强的资鉴当世的现实功能。因此,无论是从学科发展来看,还是就社会需要而言,能否充分发挥中国当代社会史这一新兴学科的现实功能,是推动其成长壮大的关键所在。

中国学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学致用”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更应围绕党和国家的大局来开展。比如,党和国家决策中涉及民生的内容不仅可以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而且还应将之作为摆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而以现实中的民生问题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为党和国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供资鉴,而且还可进一步凸显该学科的重要价值。以下就以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及医疗改革与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为例略加说明。

食品安全是近年来被国人广为诟病的重大问题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都有四五起食品安全事件见诸报端,从三聚氰胺到染色馒头,从地沟油到注胶虾,食品变成化学试验品震惊社会,社会的诚信安全底线摇摇欲坠。为了重树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自2010年以来,党和国家作出系列部署,命各地政府严打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并强调要“重典治乱”,加大惩处力度,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可是,在我们为党和国家决策欢欣鼓舞的同时,亦不得不思索,为什么以前不是这个样子?除了随着经济发展公民对食品质量的要求相应提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政府监管为何如此被动?思考过后,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人类社会呈波浪式的阶段性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该阶段特有的社会问题产生,聚焦于这些阶段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研究能够较为准确地勾勒出社会发展曲线。从这一角度,就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近年来党和国家指导方针上的变化及更新,包括“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部署;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已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全方位的社会管理创新任务艰巨,刻不容缓。

医疗改革与公共卫生更是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人均预期寿命不仅是最具综合意义的民生指标,更能直接反映医疗发展的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曾经创造了人均预期寿命1957—1981年24年(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年均增长0.45岁以上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却明显放缓,1981—2008年27年年均仅增长0.19岁多一点,不但明

显低于改革开放以前,也落后于同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水平。之所以会出现此种现象,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国民医疗保障水平的变化是一重要原因。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食品供应基本满足并平均分配以及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改善等都对国民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其中以预防为主的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为完整且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功至伟。反观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此前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不复存在,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以预防为主转变为以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快速解体,卫生事业经费支出比重逐年递减,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学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而且,直到世纪交替,在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未达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全体人口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既定改革目标并未实现,人民健康水平未能得到明显改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时期人均预期寿命的极低速增长。

从某种程度上讲,党和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再次给予极大重视是与“非典”危机密不可分的。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一场疫病危机,中国内地又是重灾区。事后看来,“非典”只是一种此前尚不了解的呼吸道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几种传染病相比并不可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血吸虫病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而人们在疫情发生后的举足无措和极度恐慌的社会气氛却是十分可怕的。抛开政府方面的责任不说,学者的失语和缺位亦备受诟病。甚至有舆论界人士呼吁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积极地行动起来,致力于这些中层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危机过后,全国上下都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建设和完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从而加速了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进程;医疗体制改革也很快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医改“失败”说、“滞后”说一时间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各种意见和建议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新的更加成熟的医改方案是“非典”危机带来的正效应,而更重要的是,经历了这场危机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即认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是万能的,发展的目的不是GDP,不是物,而是人。

其实,对于这些所谓“中层社会问题”,历史学家亦应给予极大关注,运用其本应掌握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经验及智慧,在危机时刻协助政府制定理性的公共政策,引导公众具备健康的心态,帮助社会以最小

的代价度过危机。这也是史学的重要功能所在。对此 早在古代即已有明论。如司马迁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谓 史著之目的即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中国当代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鲜活事例也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比如,“非典”危机不仅暴露出当代中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着法制建设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应对能力不足,以及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平衡等问题,而且也暴露出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有用性”不足,尤其是知识结构乃至学科结构存在严重缺陷。认识了问题所在,加强研究,找出解决之方,就可为政府决策提供对症之药,资鉴作用亦可由之而显现。

总之,诸如食品安全、医疗改革与公共卫生安全等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均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选题。只要我们对这些现实问题作出积极回应,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并注意从国内外已有的社会史和社会问题研究中汲取营养,就一定能够将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学科体系快速建立起来,就一定能够为繁荣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其实,从这两年陆续推出的一些相关成果看,中国当代社会史各专题研究异彩纷呈且更加深入,并已做到紧密联系现实、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这一要求,其所探讨内容具体涉及了学科理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社会与环境、婚姻与家庭、城乡关系、人口、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中国当代社会史

〔李文(1963—)男,山西省大同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

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重要学术期刊,并逐步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对外关系史)平分秋色,像两股溪流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文化学等诸多学科对社会建设、社会发展方面研究的大潮交汇在一起,形成新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态势。

朱佳木曾经指出“当代社会史与古代和近代社会史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历史与现实往往交织在一起;研究当代社会史问题,不仅需要而且有可能与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紧密结合。”“如果当代社会史研究脱离对这些现实重大问题的关切,不为解决这些问题去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探寻规律,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难以有所作为。”^[1]更何况,历史学本身就是以资政育人宗旨的。王夫之在评价司马光组织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史家当“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卷末《叙论四》。由此而言,中国当代社会史既是应运而生,就当顺势而为,研究者对史家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可不察。

〔参考文献〕

- [1]朱佳木.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6).
- [2]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念

郑清坡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近些年,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碎片化”倾向的批评越来越多。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选题过于琐碎,好像什么都可以纳入社会史学科的研究范围,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碎片化”现象。这种批评指出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某些不合理现象,虽有偏颇之处,但的确应谨慎对待。对于仍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这一新兴学科而言,尤应充分吸取借鉴既往社会史研究经验以有效避免这一不良倾向。一方面,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以确立历史事实的具体存在为首要任务,追求史实本原,确立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实进行单纯描述的基层

史学层面,而应在确立了的史实基础上探求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律,进而在理论上有所提升。如此,才能避免出现真正的“碎片化”问题。这就需要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整体观念,即处理好史实与理论相结合、区域与整体和打破1949年断代的界限几方面关系。

一、史实与理论相结合

中国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出现某些“碎片化”现象,是与有些论著仅仅停留在烦琐的史实描述和特征罗列、就事论事以及缺乏背后的问题意识密不可分的。虽然这是对过去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的学术高度意识形

更有利于发现问题,以及探究社会发展中内在联系的逻辑。同时,唯有放长研究时段,社会发展理论也才能在实践中得到更多检验,才能发现各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总之,中国当代社会史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薄弱领域。因此,探求这个时期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的具体形态及运行,便成为首要任务。只有弄清这些,才能够进一步了解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经济社会生活存在很大差异,难以一下把所有情况都搞清楚,采取区域路径也就势所必然。在此情况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可能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碎化”现象,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在可允许的范围内。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并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而应在确立了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探求史实间的相互关系,并能够提出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的中层概念;更进一步的则是构建历史衍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揭示

[郑清坡(1978—)男,河北省定州市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社会史、区域经济史研究。]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由此,则需要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注重史实与理论相结合以及空间与时间的整体观念。在社会史选题时,时常会提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即是正确处理局部或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大处着眼,就是要有宏观视野和整体的系统观念,避免研究的真正碎片化;小处着手,则是研究要扎实,不作空泛之论。所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即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 [1]吴承明.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 [2]拉得克里夫·布朗. 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J]. 社会学界, 1936(9).
- [3]李金铮. 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J]. 河北学刊, 1998(6).
- [4]陈春声. 走向历史现场[J]. 读书, 2006(9).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alized Topic)

Organizer: LI Wen-hai

Editorial: Since its revival in the mid 1980s,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a series of important works published, has ma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However, the study is still insufficient, compared to those of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Consequently, we and Hebei Academic Journal co-organized this specialized topic so as to carry some academic implications for scholars in this are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discussions on this topic.

Key Words: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broaden and deepen;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reformation of literature; reality function, issue awareness

[责任编辑、校对:把增强]